

·名人名著译丛·

当代史导论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3

3

·名人名著译丛·

当代史导论

DANGDAISHIDAOLUN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张广勇 张宇宏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K10-53

B043

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ublished in Pelican Books, 1967

中译本据 Pelican Books 1967 年版译出

当代史导论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张广勇 张宇宏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本

ISBN 7-80618-274-8/K·228

定价:14.00 元

140267

“放眼世界,展示全球”

——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代序)

张广智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年)是当代国际史学界颇享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我国,随着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的迅猛输入,巴勒克拉夫的名字也很快地在中国学界传播开来。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世界史理论,在我国史学界的广布,主要得益于两部中译本书籍的出版:由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①此后,其人其作被中国学人广为征引,声誉鹊起,而他的“全球历史观”及宏观世界史体系的构架则更令人瞩目。目前这本《当代史导论》是他具体贯彻前一宗旨的当代新史学名著,堪称他所有论著中最为成功的一本。三者虽各有侧重,且又互为补充,构成一体,完整地体现了他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的杰出成就。

^①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 1985 年出版。又,三联书店还特将这部地图集的文字部分以《世界史便览》结集于 1983 年单独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此书以“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第一辑)推出,初版发行 8 万册,坊间流传甚广。

(一)

一本传记用这样的笔墨勾划了巴勒克拉夫的形象：

他穿着陈旧的粗花呢茄克衫，里面套一件从伦敦马市场上买来的羊毛衫，黄褐色的领带，显得十分单调，下身穿的是条老式的牛津裤子，只有脚上那双英国式的轻便鞋，偶而掠过一丝微光。他看上去脸色不错，秃发奇特地倒向一侧；他行走敏捷，但走路姿势十分古怪，摇摇摆摆的步态中充满着好奇与幻想。他嗜烟为乐，一只用过多的旧烟斗从不离嘴，从那上面飘出一团团浅蓝色的烟雾，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没完没了……

的确，巴勒克拉夫衣着很随和，生活无所求，没有英国式绅士的翩翩风度，但他钟爱他的学术事业，有着一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执着的追求，并为此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对于这样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史家的生平，我们有略加介绍的必要。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年5月10日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布拉德福特，父亲沃尔特·巴勒克拉夫是该城从事羊毛贸易的富商。他曾受教于约克大学、牛津大学等学校。在牛津奥利尔学院就学时，巴勒克拉夫逐渐培养了对欧洲中古史的浓厚兴趣。早年他所接受的史学教育，不仅有英国的自由主义史学思想，而且也受到过德国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1929—1931年巴勒克拉夫在慕尼黑大学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并在那里成家。

巴勒克拉夫的学术事业是在罗马奠定基础的。1931—1933年，巴勒克拉夫在罗马的英国学院从事教皇史的研究。1934年，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公证人与罗马

天主教廷》出版。次年,《罗马天主教廷圣职委任制》一书问世。两书的出版,足以说明他当时已是一位超越英国乡土观念的中古史研究专家了。

1934年,巴勒克拉夫因获得牛津大学莫尔顿学院的奖学金,重返英国。1936年,他迁往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稍后,出版了《中世纪的德国》(2卷本,1938年),并担任《中古史研究》的主编。这时,他在英语世界中,已是一位遐迩闻名的德国中古史的一流学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克拉夫最初在英国外交部供职。不久,擢升为英国皇家空军少校,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空军部任职。在战争期间,他撰写了《近代德国的起源》(1946年出版),此书在战时流传很广,书中所推荐的政策已为英国和美国政府所采纳。

1945年至1956年,巴勒克拉夫担任利物浦大学中古史教授。他在十分欢愉与平静的气氛中度过了这十多年的教授生涯,尤其在该地,他所确立的一套关于档案管理的计划,使整整一代的英国档案工作者都受到训练,获益匪浅。其间,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中世纪帝国》(1950)、《柴郡豁免权》(1957年)、《伯爵领地与查斯特郡的王室特权》(1953)年。他的著名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亦于1955年出版。

1956年,巴勒克拉夫接替阿诺德·汤因比,受聘为伦敦大学“斯蒂芬生国际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并负责主编这个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他是这个年刊的1955—1956年、1956—1958年和1958—1960年各卷的执笔者。《国际事务概览》一般代表了英国官方的意见,但也有一

定的史料价值。然而，他对编纂年刊的工作，逐渐产生厌恶情绪，于是在1962年毅然放弃了这里的职位，重新回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巴勒克拉夫写作了《当代史导论》（1964年）。1964—1967年，他还担任过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职务。

1965年，巴勒克拉夫赴美国讲学，先后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65—1968年）和布兰德斯大学（1958—1970年）。其间出版了《中世纪的罗马教皇》（1968年）。

1970年，巴勒克拉夫应牛津大学之聘，任该校近代史教授。在牛津的2年，由于同事倾轧，课程繁重，弄得他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终而不能潜心写作。这使他感到不满，压抑，便离开牛津，再次回到了布兰德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1981年。在这之后的将近10年时间里，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执笔不辍，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多产的时期，这时出版的著作计有：《欧洲的考验》（1976年）、《处于变动经济中的管理》（1976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6年）、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979年）、《基督教世界》（1981年）、《从阿加迪尔事件到大决战》（1982年）等。他的声名在美国各大学传扬，他的著作鼓舞了欧美乃至整个世界的年青一代的学者。

1981年，巴勒克拉夫从布兰德斯大学退休，第二年他曾去慕尼黑任教。此后他重病缠身，返回乡里，在英国牛津郡勃福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他死于1984年12月26日，终年76岁。

(二)

巴勒克拉夫最初是以欧洲中古史的研究成果登上史坛的,但他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却以此为基础,上下推溯,左右延衍,乃至学贯古今,终成大家。纵览他一生的史学遗产,我们认为,其中最富启迪和有见地的是他的宏观的世界史观。

近年来,我曾在一些论著与学术讨论中,多次谈到了西方史学自古迄今所历经的5次重大的史学转向,最近在《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一书中也有涉及。^①这里为避重复,恕难一一申论。我所说的第5次转向,指的是西方史学在50年代中叶前后所发生的当代新史学潮流。这与巴勒克拉夫之见相吻合。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②这一思想,却导源于他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时,他就明确地指出,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③

巴勒克拉夫是一个深谙德国传统史学的西方史家,他早年所走过的路也正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所开辟的。正因为他是从西方传统史学的营垒内部“大杀回马枪”的,因此他对这种史学的弊病的了解与认识自然较

① 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10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前引书,第1页。

③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1955),第8—10页。

常人要深刻一些,对它的批判也就更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他的著作所揭示的“重新定向”,鲜明地体现了他对19世纪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正统史学的全面挑战,其攻讦矛头直指西欧中心论。

西方世界史观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此处不容详论。简单说来,在18世纪,德意志哥丁根学派一些史家就开始倡导编纂新型的世界史,譬如格特尔在1760年就提出过:“世界史应当怎样布局?什么内容可以写入世界史?它的各部分怎样安排才能各得其所,恰到好处?各部分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怎样确定时间断限?各部分的历史应当怎样分期?”^①在当时,这自然是属于空谷足音的史学议论。倒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宣扬的欧洲是世界历史中心的观点却在19世纪的西方弥漫开来。^②“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③黑格尔的这句话也正是18世纪哥丁根派史学西欧中心说的一种“回声”,继而这位哲人用“世界精神”之说来进一步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的种种言论,便不再是一种“回声”,而是西欧中心论的一种直露了。至兰克,西欧中心论已发展为系统和典型。兰克在晚年编撰、生前未及完稿、死后由其弟子整理补足的《世界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

① 转见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它的过去:史学史研究》(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44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110页。又,在哥丁根学派史家看来,从全球角度来考察,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其基本点也在于欧洲对整个世界的支配。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1页。

为主体的世界史,反映了西方列强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这就把哥丁根学派提出的15世纪以后的欧洲中心说扩大为贯穿古今的系统的西欧中心论。

巴勒克拉夫依据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急速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审视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收的十五篇论文,集中于一点,无不指向兰克的西欧中心论的,正如汤因比在评论这本文集时所说,“这里有足够的炸药,能把19世纪的西方历史主义烧为灰烬”。^①而兰克强调理念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及确认只有通过真实的个体才能把握整体的历史精神,使他成了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最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引发巴勒克拉夫批判兰克的世界史观的“第一个暗示”是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此战苏军的胜利“迫使欧洲历史必须全部改写”。于是他察觉,面对这个处于变动中的现实世界,他过去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已不敷应用,更不能用它来对现实的变化作出正确的解释。他为之困惑,不禁疑从中来,由怀疑而批判,他省悟到传统的世界史观已为事实所不容,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②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③

① 汤因比的这句话,被印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的书皮上。

②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第133页。

③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第27页。

巴勒克拉夫 1955 年所说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在 21 年后则有了更新的说明，这就是他倡导要建立的“全球的历史观”。^①“1945 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②这是“全球历史观”出现的社会动因。其次，从史学自身来说，确立一种完全立足世界的“全球历史观”，即超越国别、地区或民族的界限，已成了当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盛行于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史学在当代西方遭到了冷落，世界主义史学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史学，这是“全球历史观”问世的学科动因，也是史学科学化的必然趋势。

巴勒克拉夫所要建立的“全球历史观”是与陈腐的西欧中心论的对立。从这种对立及其演变中，人们莫不感受到西方史学乃至整个国际史学不断前进的步伐。由此，我们可以察觉到巴勒克拉夫论见的时代意义与史学意义。

第一，“全球历史观”需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抛弃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早在 50 年代中叶，他就指出，如果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及对它的影响，也就无法理解欧洲的历史。他特别说到，亚洲正在崛起，它在不久的将来，将把欧洲抛在后面；^③他不无远见地预言，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太平洋时代，“到了 20 世纪后期或 21 世纪，欧洲将注定会沦于类似 18、19 世纪曾经加于非洲、部分亚洲和新大陆的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242 页。

②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243 页。

③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第 217 页。

殖民地地位”。^①在这里,重要的不只是其论见在多大程度上应验了以后事态的发展,而是从时代脉搏与社会变革在这位历史家那里所激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响中,给人们引发或多或少而又值得深省的理论思考。

至70年代,他进而提出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一切民族的建树”^②,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③因此,“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里,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④这是当代社会变革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在史学上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反映。

第二,如此看来,传统的世界历史的三分法在巴勒克拉夫那里也就无立足之地了。近代德国学者凯勒尔著《上古、中古和新时期世界史》一书,第一次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时期,后世西方学者沿用不绝,至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已发展到顶点。对这种三分法的正确性,他曾多次提出过异议。他指出,即使用这种三分法来编列欧洲历史是否有充分的根据,也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那么,如用这个三分法套用到亚非史的研究中,那

① 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第208页。

②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3页。

③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8页。

④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3页。

出现的问题就更大了。^① 倘仍一味墨守成规，死抱住这个三分法不放，其结果就只能是方枘圆凿，适得其反了。

第三，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即这种新史观要注重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他说：“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② 这一思想，在他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前言”中也有强调：“我们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③ 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传统的西方世界史体系通常是国别史的汇编，类似列国志一类的结构框架，从1736—1765年英国学者J. 坎普贝尔辑集的38卷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至本世纪初由H. S. 威廉斯主编的《史学家的世界史》(25卷)及著名的《剑桥三史》等，大体上都还不能脱离国别史的汇编的窠臼。诚然，世界史需要包括国别史或地区史的内容，并以此作为实现其自身目标的一种必要的条件。所谓世界史的自身目标，简言之，即人类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分散的人群发展为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行程。因此，作为用“全球历史观”编纂的世界史，既要陈述人类历史如何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也要阐明世界各地区间由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和由彼此分散到合为整体的历史进程。换言之，即要写出人类历史发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4页。

②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58页。

③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3页。

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以及两者怎样互为条件而又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正如我国学者吴于廑教授所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①吴先生的论断与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可谓是珠联璧合、不约而同的真知灼见。

在此,我们还要专门再提及一下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本地图集,对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它用早期人类的世界、最初的文明、欧亚的古典文明、划分为地区的世界、新兴的西方世界、欧洲统治时期、全球文明时代这样7个题目,阐明了前述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发展为密切联系的整体进程。在这里,西欧中心论的旧观念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传统的三分法也不见了,图集制作者无不设法把世界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史事置于世界全局之中,力图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客观过程。这本地图集的问世,反映了时代变革对西方史学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也是巴勒克拉夫贯彻其“全球历史观”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三)

✎

在本节,我们需要着重讨论一下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已如前述,这是他一生众多著作中最为成功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吴于廑:《世界历史》,第1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一部。它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该书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宏观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本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勃兴的世界史整体研究的新史学潮流，不失为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名著之一。它具体显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世界整体，而不是从欧洲一隅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是《当代史导论》最显著的特点。巴氏在本书一开篇就指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基本前提完全不同于俾斯麦所处的那个时代。^①因而，揭示这一变化的时代特征及其原因，就成了本书作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不言而喻，只有当我们明确了“当代史”的含义后，才能正确考察它。尽管在巴勒克拉夫看来，“当代”一词的含义是模糊、灵活而又游移不定的，但他还是把俾斯麦退出政治舞台的1890年作为区别“现代”与“当代”的一个重要年份。自此以后，当代世界的基本结构与各种力量日渐形成；但他又说夸大这一年代的意义并把它作为“现代”与“当代”的分界线，无疑也是不明智的。^②事实上，“现代”为“当代”取代之前，具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两个时代的特征同时存在着。我们毋需为他的探究寻求某些具体的答案，对此读者完全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他在这本书中对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论见，也依然是一家之言。这些姑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ublished in Pelican Books 1967），第9页。

②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24页。

且置而勿论。重要的是,《当代史导论》中所显示的“全球眼光”^①或他所说的“当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价值标准”^②所给我们的启迪,而不在于作者研究的具体结论。总体上说,《当代史导论》不是从某一局部来陈述的地区史或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从全球整体来考察的世界史。为此,巴勒克拉夫抛弃了西欧中心论,他对这一陈说的批判随机触发,贯穿全书。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他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③举例来说,他在具体分析了1898至1905年间,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说道:“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失去其有效性,实际上欧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结束,其活动范围由于新的欧洲以外的强国登上历史舞台而正在收缩,决定全球政治结构的不再是欧洲均势体系。”^④作者对这一历史时期东亚形势的研究,正是他用全球眼光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显例。

因此,巴勒克拉夫正确地指出: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世界重心向非欧地区的转移。^⑤而亚洲、非洲等地区却以一种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亚非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提高,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⑥为了反

①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10页。

②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36页。

③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92页。

④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107页。

⑤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22页。

⑥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198页。

映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形势，历史学家不只是在传统的世界史框架中加若干章节以叙述欧洲之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应从总体上作出考察与安排，这就必须具备他所说的“全球眼光”与整体观念。无疑，这对于我们是颇具启示性的识见。

其二，随着历史学家观察当代世界的视野的扩大与视角的转换，《当代史导论》进一步开拓了当代史研究的范围，巴勒克拉夫曾说：“我的首要任务是探讨当代社会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种新的联系，这些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①全书八章，从总体上论述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内容，而且专章论列当代社会变迁、科学技术、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它不是一本以时间为序的逐一记述的当代政治军事史，而是广泛涉及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这种范围广阔、色彩丰富的当代史，与内容狭隘、枯燥乏味的西方传统史学著作迥然不同。

说到当代史的文化内容，巴勒克拉夫批评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即认为欧洲虽丧失了政治上的霸主地位，但依然保持着其文化方面的优势，他认为这种观念明显地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形势，20世纪的革命激发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文化复兴，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巴勒克拉夫在考察了当代世界各个地区文化的创新活动之后，不无兴奋地赞道：“这种全球性的文化创新的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9页。